



学校管理新趋向译丛

# 校长办公室 的那个人

——项民族志研究

哈里·J·沃尔科特 著  
杨海燕 译

本书是对一位校长的工作与生活所做的民族志考察，通过生动、丰富的日常生活的现场描述和行为分析，使我们进一步理解校长们真正地在做什么、怎样做，以及为什么这样做。因此，本书的出版不但为我们理解校长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也为我们学习使用民族志研究方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本。



重庆大学  
出版社

# 校长办公室的那个人

——一项民族志研究

哈里·F. 沃尔科特著

杨海燕 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

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the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entitled *The Man In The Principal's Office: An Ethnography*, Updated Edition, by Harry F. Wolcott. Copyright 2003 by Altamira Pres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73 by the University of Oregon.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utiliz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by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CHINESE SIMPLIFIED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CHONGQING UNIVERSITY PRESS, Copyright 2009 by Chongqing University Press.

校长办公室的那个人:一项民族志研究(更新版),作者:哈里·F.沃尔科特。原书英文版由 Altamira 出版公司出版。原书版权属 Altamira 出版公司。

本书简体中文版专有出版权由 Altamira 出版公司授予重庆大学出版社,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

版贸渝核字(2008)第12号。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校长办公室的那个人:一项民族志研究/(美)沃尔科特(Wolcott, H. F.)著;杨海燕译.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 2009. 11

(学校管理新趋向译丛)

ISBN 978-7-5624-4880-8

I. 校… II. ①沃…②杨… III.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IV. C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75147 号

### 校长办公室的那个人:一项民族志研究

哈里·F.沃尔科特 著

杨海燕 译

责任编辑:雷少波 刘丽萍 张立武 版式设计:雷少波  
责任校对:贾梅 责任印制:赵晟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张鸽盛

社址:重庆市沙坪坝正街174号重庆大学(A区)内

邮编:400030

电话:(023) 65102378 65105781

传真:(023) 65103686 65105565

网址:<http://www.cqup.com.cn>

邮箱:fxk@cqup.com.cn(营销中心)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升光电力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710×1020 1/16 印张:18.75 字数:347千

2009年11月第1版 2009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 000

ISBN 978-7-5624-4880-8 定价:48.00元

---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  
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违者必究

本书得到：

教育部“211 工程”三期子项目“中国特色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学科平台建设”的资助

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市重点学科(教育经济与管理)资助

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项目(项目名称:超大规模高中的办学效益及其适度规模研究;项目编号:07XNB033)资助

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 2007 年度教育部青年专项课题《超大规模高中的办学效益及其适度规模研究》课题编号:EFA070232

# 作译者简介

**哈里·F. 沃尔科特** 1964年在斯坦福大学取得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是研究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阿勒特海湾地区维内吉岛的夸扣特人和他曾在那里任教的一所学校,那所学校只有一间屋子,之后,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出版著作《夸扣特村庄和学校》(Holt, Rinehart & Winston, 1967)。

在他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俄勒冈大学经授权成立了一个由联邦资金支持的研究中心——教育管理研究中心,沃尔科特为了完成博士学业而成为了这个研究中心的一名助理教授,并开始从事教育管理方面的研究。《校长办公室的那个人》就是沃尔科特在这个研究中心独立从事的第一项研究。

沃尔科特终身在俄勒冈大学教育与人类学系任教。随着对民族志研究兴趣的增加,沃尔科特将注意力集中于从不同的角度研究民族志方法,他的成果包括《质性资料的转换》(Sage, 1994);《田野研究的艺术》(AltaMira, 1995);《民族志:视觉方法》(AltaMira, 1999);《质性研究的写作》(Sage, 1990 & 2001)等。

**杨海燕**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育研究所,副教授,管理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发展战略、教育管理与政策等。于《中国教育报》《教育研究》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三十余篇,多篇论文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复印中心全文转载。出版专著(合著或合译)作品有:《城市化进程中职业教育发展研究》《走向校长专业化》《副校长——有效学校领导的关键要素》。现主持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项目“超大规模高中的办学效益及其适度规模研究”、中国人民大学青年项目“专业化背景下中小学校长激励与约束机制研究”。曾围绕“校长专业化及校长管理制度”“学校发展规划”“校长领导力及学校沟通”等主题,为全国各地的中小学校长培训班做专题报告。

电子邮件:yanghy2599@126.com

# 译者前言

19世纪中叶,随着以孔德为代表的实证主义的兴起,学术界开始对量化研究方法产生兴趣,认为量化研究具有自然科学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应该引入社会科学研究领域。20世纪60年代,社会科学工作者发现社会现象的研究并不同于自然现象的研究,采取客观的理性方法并不能很好地解决社会问题。之后,随着人们对量化研究的质疑以及复杂的社会现象对新的研究方法的迫切需要,质性研究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逐渐引起重视并得以广泛推行。从方法论而言,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是相对的。量化研究遵循的是逻辑实证主义(logical-positivism),质性研究遵循的是现象学的解释主义(phenomenological interpretivism)。逻辑实证主义应用量化和实验化方法以验证假设—演绎的类推性;现象学应用质性自然探究法,以归纳的方式从整体上了解在各种特定情境中的人类经验。由于这两种研究方法存在显著的差异,因而在社会研究领域,这两种研究方法孰重孰轻一直成为研究者不断争论的主题。

质性研究在文献上亦被称为“民族志”(ethnography)、“参与观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质性方法”(qualitative method)、“质性观察”(qualitative observation)、“自然探究”(naturalistic inquiry)、“个案研究”(case study)、“田野或现场研究”(field study)等。对质性研究的普遍性的定义是,质性研究指以研究者本人作为研究工具,在自然的情景下采用多种收集资料的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整体性探究,使用归纳法分析资料和形成理论,通过与研究对象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的一种活动。质性研究方法的优势在于:它注重对调查对象的社会和文化背景、历史状态与发展过程进行动态的考察,比较适宜对少数个案在微观层面进行深入的多侧面的分析研究。表现在:第一,把人的体验放在了突出的位置。强调从当事人的角度了解他们的看法,注意他们的心理状态和意义建构。同时,研究对象的主观体验也是重要的。第二,质性研究方法从整体的角度分析问题。质性研究不主张把现象割裂成几部分,而是使用语言和图像作为表述的手段,在时间的流动中追踪时间的变化过程。这与社会现象是流动的、复杂的、有机的整体的特点是相适应的。第三,质性研究注重对研究结果的解释性理解。质性研究不是要

通过一个设计严密、不能反复的程序去证明一个研究者预先设定的假设,而是需要在尽可能自然的状态下,研究者试着进入研究对象的世界中去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在质性研究中,研究者始终保持开放的态度,从研究对象的视角,用研究对象的语言、概念等符号去诠释他们日常生活中所发生的事件,不求找到能够推广的普遍适用的规律,但求深入研究对象的实质,理解他们眼中的生活和行为的意义。因此,质性研究更适合对研究对象作深入细致的研究。但质性研究方法也有其局限性,表现在:第一,它是依据少量个案的资料得出结论,这种结论不一定具有普遍性;第二,研究方法无定式,分析过程难以标准化,容易产生不准确观察和主观推论,而且研究结论也难以用科学的手段加以验证。

因此,面对两种研究方法各自所存在的不可回避的局限性,将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相结合,应该是社会科学走向研究科学化的必由之路。这也是社会科学工作者所应追求的真正的科学精神所在。

目前,在我们越来越多地认识质性研究并越来越多地使用这种研究方法的过程中,我们知道,民族志研究是质性研究的一种方法,它的研究目的在于对人类社会行为进行描述与分析,通过运用田野调查方法,并结合人类学方法,民族志学者选择性地记录人类行为的特定层面,以便从文化角度对该行为进行解释。本书作者提供的是对小学校长进行的民族志研究,“目的是从文化的角度描述并分析小学校长的日常生活。研究并不仅仅关注一个特定群体——小学校长——同时也关注一位特定小学校长在某一特定时期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因此本书作者所采用的民族志方法无疑会对我们认识和学习使用这种方法、认识和学习使用质性研究方法产生深刻的影响。

本书的翻译之所以使用“一项民族志研究”而不是“一项质性研究”作为副标题,是因为作者本人认为民族志不完全等同于质性研究,他认为“民族志保持了其根源于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某些特质,而不是以质性研究在某个时间的同义词而获得广泛赞誉。当然能够看到质性研究进入更加繁盛的时期也是令人满意的。《校长办公室的那个人》刚好处在那个交汇点上。”另外作者还认为“这种民族志研究虽探讨身为校长的他做了哪些事,但也不能忽略他个人更广泛的工作和生活背景,也不能忽略那些表面上似乎与校长职业角色不太相关但实际上对校长的工作产生重要影响的各种因素。关心背景以及人类生活中那些复杂的相互关系,正是民族志研究不同于其他社会科学研究的区别所在。民族志的研究对象是现实中的人们以及真实的人类行为,强调的是行为的社会层面,而非生理或心理层面。”基于此,本书将副标题译作“一项民族志研究”以充分展示作者对民族志的理解和运用,并以此来表达这项民族志研究作为教育研究领域质性研究的起点所带给我们的喜悦与崇敬之情。

如今,量化研究虽然仍主导着我国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但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并尝试使用质性研究来分析和探讨我国的社会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很高兴能把这本用质性研究方法研究教育问题的经典之作翻译成中

文,让我们能有机会追寻西方教育研究领域的质性研究的第一个足迹,从中体会和学习真正的、虽略显幼稚但朴实无华的民族志研究——一种纯粹的质性研究。

教育问题的复杂性、多元性、模糊性注定了教育研究不可能采用单一的研究方法。而教育研究的质量和水平的高低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研究者研究能力和水平的高低。因此,教育研究者作为研究的主体,要不断提升对质性研究方法的理论和实践运用的水平,掌握具体的研究方法与技巧。本书作为教育研究领域中使用质性研究方法进行研究的经典著作之一,必定会给教育研究领域的同仁带来或多或少的帮助。这也是译丛主编褚宏启教授和重庆大学出版社所希望产生的良好的学术影响和学术引进的结果。

最后,感谢译丛主编褚宏启教授和重庆大学出版社对我的信任,翻译虽历经两年的修改与审度,但由于本人对质性研究的理解和掌握还不够深入和全面,译文定有不恰当之处,还请读者不吝指正。

杨海燕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育研究所

2009年3月1日



# 前言(2003)

当我在四十年前刚开始写《校长办公室的那个人》这本书时,它看起来很难成为一部经典之作。实际上,这本书能够问世也只是牺牲了一个助理教授的薪水,除此之外没有任何花销。很难想象在那时会有那么好的教育研究环境,而在当时这种环境却很容易被忽略。

这项研究是我完成博士论文后的第一项独立研究。看起来似乎是选对了研究方向,但是它跟我最初想象的情形并不一致,我所期望的是可以自由地选择我愿意研究的主题,或是自由地选择任何一种直接面对学校的研究。我与斯坦福大学教育与人类学教授乔治·斯宾德勒讨论了这种研究的可行性。他是我的导师兼终生挚友。我们一直讨论做一个班级的民族志研究(包括校内和校外)的可行性。很显然,要想保证这一研究的可控性就需要寻找一个小学班级作为研究对象。但是,为了完成我的博士学业,我接受了俄勒冈大学新成立的教育管理研究中心的助理教授一职。这就要求我的研究课题必须与教育管理相关。关注一名小学校长比关注一个班级更能符合这一要求,为此,中心允许并鼓励我从人类学角度(不管它是什么)开展这项研究。

对我来说,想要侥幸完成这项研究并形成系统的论述,就意味着我的研究范围仅限于很少的几位校长,甚至仅限于能保持密切联系的一位校长,并对他的实际行为进行研究。在完成研究并最终成书时,我曾经写道,我几乎是歪打正着了(Wolcott, 2003)。但是,至少在田野调查的那一部分,我坚持做到了人们期望一个人类学家在那个环境中所应该做的事情。那么,实际上我最终的成果到底是什么呢?当然是民族志。这正如我在为这一成果命名时所期望的那样,这项研究最初的名字是《关于校长的一部民族志》,后来改为《关于一位校长的民族志》。

那时,民族志在人类学研究领域之外鲜为人知。我确信直到今天依然如此,部分原因是它很容易与所谓的质性研究混为一谈。质性研究被广泛应用于很多领域,但人们很难界定清楚质性研究究竟是什么。今天,民族志这一概念被愈来愈广泛的研究领域的学者所使用,他们试图观察处于其他群体中的人们在做什么,或者处于自身所在群体中的人们在做什么,有时这些研究者也关注自己所做的事情及个人感受。在这一

方面,20世纪中叶的民族志学者比其他时期更引人关注。

如果有人抱怨周围环境的快速变化,我想我应该跟大家分享我个人的一些想法,这并不是因为我要对这些变化直接负责,而只是因为我刚好经历了这一变化过程。在20世纪60年代,人类学家仍然倾向于做田野调查,然后回家写出研究报告。我就是那样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夸扣特尔印第安人中完成我的博士论文的。之后,我对博士论文进行了修改,然后作品被收录于1967年出版的由乔治和路易斯·斯宾德勒主编的系列丛书“教育与文化案例研究”。

当时,俄勒冈大学新成立的教育管理研究中心正想招聘一位纯粹的人类学家成为其研究团队的成员,但是人类学系并不培养这样的人才,尤其是这个人类学系是以其考古人类学著称的。因此那些负责招聘研究人员的人不得不对找到像我这样的“半瓶子晃荡的人”而感到满意,其实我也就是一个为完成学位研究而学习过文化人类学的教育专业的博士生。但在这一点上,我确实是带着光环来到俄勒冈的,因为我是斯宾德勒教授所带的学生中最早研究“人类学与教育学”的学生之一。我曾经成功地完成了田野调查工作并写出了研究报告。我又一次交上了好运,这次不是斯宾德勒教授,而是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梭伦·T.金柏尔教授,他帮助我找到了这份工作。我得到了全美仅有的两位同时研究人类学与教育学的教授的推荐。

我无法告诉你我的职业生涯与人类学和教育学的发展之间的联系有多么紧密,也无法告诉你我是多么幸运地通过自己所做的事情推动这一研究领域最终独立成形。像这样一本出版物能够发行如此之久,似乎可以认为我正在塑造这一领域。但是《校长办公室的那个人》确实是为民族志找到某种归宿做了开创性的工作,同时也将其带入现代教育与学校研究之中。从我开始做这份田野调查报告到这本书的最终出版历时七年,人类学与教育理事会也终于在此时成立了。它的成立至少为我们讨论“民族志”之类的内容提供了一席之地。

尽管还有一些人类学家仍然没有多少兴趣研究教育,但少数与这一项目类似的研究还是成为许多人学习的范本。《校长办公室的那个人》可以说在合适的时间出现在合适的地点。对此我在《镜子、模型与监视器:教育家对民族志变革的适应》(Wolcott,1982C)一文中详细的说明。

在这篇文章中,我阐明了这本书是如何以针对一个人的细致研究为基础,试图向校长们讲述并描绘出一个校长本来面貌的真实画面。这本书达到了这一目的,并经常被引用用于教育管理课堂中。但是,这并没有实现这本书的根本用途,即向学生解释应当如何完成民族志研究,并且为学生们提供一个可以运用到其他教育情境研究上的范本。我认为这本书在课堂中的真正价值应该是教会教育者们如何做质性研究。它提供了描述性的而非判断性的方式来看待问题,它往往开始于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这里正在发生什么事?事实上,在20世纪70年代晚期,教育家同样关注于评价问题。我不得不承认我的研究有时被当作评价研究的一个范本,所谓今日批判民族志的先驱。

因此文章导言的第三部分是围绕本书的种种用途和它所服务的读者展开的。

## 关于艾德·贝尔

《校长办公室的那个人》与艾德·贝尔本人都经历了时间的检验。艾德在几年前退休了(按他的几个年轻同事的说法:终于退休了)。他和妻子都还生活在我们进行研究时就居住的那幢房子里。他们现在热切地期盼着孙子孙女们偶尔来访。正如艾德对他退休后的生活所描述的那样,他和妻子整天开心地忙于跟家人或者是教会里的朋友聚会。

我们住在小镇的另一边,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圈子里,即使在路上我们也很少相遇。但是,我非常有幸参加了他们夫妻的金婚典礼。在典礼上,我很高兴地给周围客人们讲,虽然艾德在我的这项研究中签的是假名,但他很可能是全美国最有名气的小学校长。2001年,我又去拜访他们,送去这本书的新版本,是由台湾花莲师范大学的白亦方教授翻译的中文版。对于我们来说这一版本仅供快速阅读,因为在书中我们能认识的只有我们的名字。

我想,早先我所认为的发展趋势现在看来更像是在主方向上发生的各种变化。通常地方学校和州政府都受困于资金短缺;当人们为寻找能买得起的住房而搬到更远的地方时,原来居住地区的学校的入学人数相应地不断减少;老人们更愿意看到我们所谓的“美好往日”重现,而实际上,过去的日子并不比现在更好,只是因为我们对它们的转变心中有数而已。在将来,当新的问题出现而没有找到答案之前,今天也会成为下一代人眼中的“美好往日”。

今天的学校与我进行这项研究时的学校相比,或者与我任教时(1950年代中期)或是我上学时(1930年代中期与1940年代)的学校相比,应该说是更加井然有序,更加关注可测量的结果并对监护人负责,而较少关注一个“完整的儿童”。但这种压力源于上述现实的改变,而且在高年级时表现得更为突出。六岁的孩子仍然是无拘无束的,而一旦进入高年级,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会感觉到压力和竞争。同时还是有像艾德那样的人致力于将学校办成一个令人愉快的地方,一个有益的“学习场所”,一个能够带给你美好回忆的地方。

对艾德来说,距离那段校园生活越久远,他对那段时光的回忆就越美好。他对于我在1966到1968年间与他相伴的生活以及后来我是如何记录那段生活的回忆也同样散发着光彩。他经常提到我如何通过引发他进行自我反思而促进他的专业成长。其实,促进他的专业成长并不是我进行这项研究的目的。当然,事实上也只有他自己才知道这项研究对他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不过无论如何,当我听到他对我的肯定时,我还是非常高兴的。我知道,这其实就是他一贯的做事风格,他总是使事情向好的方面发展。

像这样的研究究竟要作出什么贡献呢?我感觉我们需要更近距离地审视学校是如何运行的,特别是学校日常工作是如何开展的。如果作为研究中心,我们

的使命是改善学校的运行,我们如何才能实现呢?最后的结果又将是什么呢?随着研究的持续推进,即使是针对一所学校所做的详尽的描述,也会告诉我们很多有关公共教育的实际情况。而这些对我来说,是以人类学为视角进行研究所应该作出的一种贡献。

这项研究作出这样的贡献了吗?面对这样的问题,当时我是要准备捍卫自己的研究成果的,然而在四十年之后,答案应该是毋庸置疑的。它不仅记录了过去的情况是怎样的,而且还告诉我们事情何以发展到今天的样子。在明确规定权限的制度下来运行学校——校长们知道总有一些事情他们应该做或能做而没有做,也总有一些事情他们可以做得更多或更好。但是当他在每一天、每一周都按照预定的几个小时把一大群不同年龄的学习者关在学校里时,他就只想去做一件事了:把学校维持下去。这就是一个关于学校管理者(维持者)及其工作内容的故事。

## 不断发展的“人类学与教育”研究

斯宾德勒要求对这一话题谈点自己的想法。尽管我收集了堆积如山的数据,但还是在第二年最美好的时光进行了田野调查,而没有直接完成写作。在我准备安下心来利用非教学时间完成这本书时——每个有资金支持的课题都必须成书——斯宾德勒决定修订并再版《教育与文化》,他的这本书在1963年出版后一直很受欢迎。他打算在修订本中保留部分旧的章节,但是要增加新的材料,主要是他自己的学生所作的最新的田野研究,其中就包括我的这项研究成果。

对我来说,这就意味着我要准备完成两章:一章是关于早期夸扣特尔人的研究,一章是最近尚未成文的关于校长的研究。这种诱惑十分巨大,我想让自己的文章成为斯宾德勒主编的著作的一部分,尤其是在已经找好出版商的情况下。我还意识到从我的研究中提取出一篇文章会引起人们对整个研究的兴趣,这样就会有更多的人为获取更多详尽的信息而买我的书。

关于修订版的意见越来越多,斯宾德勒决定为新版的合集取一个新名字——《教育与文化的结合:走向教育人类学》。但我发现这一修订版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最终发行。尽管我花时间为斯宾德勒写文章影响了这本书的写作进度,但这本书却比斯宾德勒那本书早一年出版(后者在1974年才出版)。

我为我的这本书以这种方式出版而感到高兴。我也很高兴斯宾德勒教授将其作为“教育与文化丛书”的一部分,特别是他愿意接受这篇比其他任何文章都长的文章并将其列入丛书。除了这篇让我有机会为大家提供最新信息的前言之外,这本书的此次再版与初版没有任何改变。

我也一直关注着人类学与教育的发展情况。当我意识到这本书为这一领域带来的影响时,我甚至希望自己写的这本书比实际的人类学更加“人类学化”一些。这可能在研究中心产生了一些压力。但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我很遗憾这篇

民族志的对象与其说是一位男性碰巧是一位校长,不如说是一位校长碰巧是一位男性。而且在那个年代,小学校长需要承担着男性角色,中学校长也同样如此。这一局面直到平权法案(affirmative action)出台才得以改变。

尽管我们的研究是在大家所熟悉的环境中进行的,但还是有一些人怀疑这项研究过分“人类学化”了,我期望研究人类学与教育的同仁们在其著作中更多地展现人类学的研究导向,更多地强调文化背景和日常生活而不仅仅局限于校园生活。我也决定在未来的研究中强化人类学的倾向。这项研究之后,我所做的另一项研究是由研究中心资助的,题目是“教师 VS. 技术人员:从人类学视角看教育变革”(1977)。题目清晰地表明这是一项以人类学为基础进行的研究。

随着这项研究的结束和全职教学工作的重新开始,我开始从学校教育过程研究转向更广泛的教育过程的研究。在这方面的最初的研究成果是一篇短文——《学习人类学》(Wolcott,1982a)和一篇关于人类学的生活史的文章——《完善的学校与不足的教育:一个坏小孩的生活史》。后者的研究已经持续了二十年,并出版了《坏小孩及其后果:田野调查中的道德规范与亲密关系》(Wolcott,2002)。

对最初研究时的参考书目进行认真的审查,可以让我们对当时已有的针对学校的相关研究有更好的了解,实际上这包括所有在“人类学与教育”领域已经发表的东西。就个人而言,我很高兴能够看到民族志保持了其根源于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某些特质,而不是作为某个时期“质性研究”的同义词而获得广泛赞誉。当然能够看到质性研究进入更加繁盛的时期也是令人满意的。《校长办公室的那个人》刚好处在这个交汇点上。它激发了更多的研究涌现出来,一些研究相对而言更加人类学化,但是在非人类学的研究中也产生了许多好的研究成果。我一直努力回答当时一个同事问到的问题:一项研究只要是好的研究就行了,而它是否是人类学的研究并不重要,这是否才是研究的真谛所在呢?

与这一版的这篇序言一起增加的还有一个人的精选书目,主要是在这篇民族志中提到的与教育研究相关的一些论著。关于这些参考书目,我必须提到两个人,他们对我的写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乔治·斯宾德勒关注我的工作长达四十年之久,为我创造了许多机会,随时给我以指导,并给予我极大的支持与鼓励;米奇·阿伦对《校长办公室的那个人》的最终出版给予了无形的帮助,当然还有两本早期著作《夸扣特尔的村庄与学校》和《教师 VS. 技术人员》也是在他的帮助下出版的。就为这一点,我也应当表示感谢。大概从1988年开始,米奇开始对我的写作产生主要的影响,他第一个建议我将自己的想法整合起来形成一篇对质性研究进行详细阐述的专题论文(Wolcott,1990b)。从那时起,他又出版(同时亲自修订)了我的另外四本书(Wolcott,1994,1995,1999,2002)。另外,还要一并感谢以前的博士生和同事,尤其要提到我的同事约翰·辛克顿和费里·扬。正是有了他们,我才顺利地度过了大学生活并得到了研究教育人类学的绝佳机遇。

# 前言与致谢(1973)

任何民族志研究的目的在于对人类社会行为进行描述与分析。运用田野调查方法,并结合人类学方法,民族志学者选择性地记录了特定层面的人类行为,以便从文化角度对该行为进行解释。民族志最关注的是那些特殊的群体,例如梯可皮亚岛人(Tikopia)或桑切斯(Sanchez)的孩子们,但也可能关注一些特殊的人类活动过程,例如沟通或离婚。

本书提供的是对小学校长进行的民族志研究,目的是从文化的角度描述并分析小学校长的日常生活。研究并不仅仅关注一个特定群体——小学校长——同时也关注一位特定小学校长在某一特定时期所表现出来的行为。然而,由于研究需要,我也会注意到那些对校长的生活产生影响的人们,如教师、其他员工、学生及家长,这些人是“他的”学校的组成部分;我还会关注到校长的行政同行、校外的熟人以及他的家人和朋友。本研究的重点是那些与校长职务最直接相关的人类活动过程。然而,这种民族志研究虽探讨身为校长他做了哪些事,但也不能忽略他个人更广泛的工作和生活背景,也不能忽略那些表面上似乎与校长职业角色不太相关但实际上对校长的工作产生重要影响的各种因素。关心背景以及人类生活中那些复杂的相互关系,正是民族志研究不同于其他社会科学研究的区别所在。民族志的研究对象是现实中的人们以及真实的人类行为,强调的是行为的社会层面,而非生理或心理层面。

检验民族志,就看其是否能够让人预测并恰当地解释处于一定的社会或社会团体中的成员所做的事情。至于本书在多大程度上达到了这一目标,读者应该能够知道,如果他们突然发现自己处于书中所描述的那所学校里,当他们遇到同事、学生或家长,或与其他校长出席学区会议时,如果身为校长,他们知道自己可能会怎么做;反之,如果他们扮演的是与校长相遇的其他角色,他们也会知道校长会有怎样的反应。

本研究采用民族志方式的理由是因为以往有关学校管理的文献很少关注小学校长的实际行为。这并不是说一般的教育文献或者针对教育管理特殊方面的文献数量不足。但是在学生或实际工作者所能获得的阅读材料中,研究方法更倾向于标准化——即告诉校长或准校长应该做什么,但他们并不知道实际情况是怎样的。虽然人们已经逐渐注意到

应该去了解教师和学校辅导员的真实课堂教学行为,但研究中所存在的对实际情况了解不足的特性也还普遍存在于教育的大部分领域。已有的关于学校管理人员日常行为的研究资料还不多,这些资料大多数源于自我报告,即校长利用工作日志来记录自己的行为(Ranniger, 1962)。这些资料受限于研究对象回忆或记录与研究有关的行动的能力,对于那些处于复杂多变的环境中的管理者来说尤其如此,因为环境本身也加大了他们回忆和记录的难度。同时,自我报告中的偏见也会对常规研究产生影响。管理者很难说出自己实际分配时间的方式,因为他们不能摆脱这样的烦恼——他们实际分配时间的方式并非是他们认为自己应该采取的方式,于是那些自我报告也就不是完全可信的。

对于那种几乎完全针对学校管理者应该怎么做,或者由当事人解释与自述的文献,本研究提供了另一种角度:由其他人来观察这位管理者的实际行为。尽管教育管理中的个案研究并未受到忽视,但多数可用资料不是研究假设就是博士论文。如果是深入研究管理的实际状况或真实的个人行为,这些资料则有可能被封锁起来以防止其流传(例如:Christiansen, 1954,关于校长对学校影响力的一个研究),或者是经过一道不可思议的审查程序后,某些应该有的名字在成果发表前就被删除了(例如,Boyan 1951,对馆际互借复印版文献的研究)。研究教育管理的博士论文多采用调查法,给十个、百个、千个行政人员寄问卷,然后再用一些高级的统计方法进行处理,从而得出区别于其他类型的显著特征。如果这些博士论文在数量上让人沮丧的话,那么认识到众多研究都是依赖这种唯一的基础性方法时,则更令人沮丧。<sup>①</sup>

除了博士论文采取个案研究外,在有关教育管理的研究中,很少有人去尝试能产生比问卷法或访谈法更大影响力的方法。将小说家与学校管理人员的禀赋融合于一人(Barr, 1971; Rothman, 1971)或两人(Hentoff, 1966)身上的研究,则提供了一种新的突破。比起那些关注其他情境中的个人特征的人类学家而言,直接研究学校管理的少数人类学家则更关注管理者的角色(Spindler, 1963a),或者特殊的管理问题,如创新(Gallaher, 1965)或整合(Fuchs, 1966)。人类学家梭伦·T. 金伯尔经常在学校管理者阅读的期刊上发表文章(Kimball, 1961, 1965),这鼓舞了很多人选择学校作为人类学研究的重要场所(Atwood, 1964; Burnett, 1969; Eddy, 1967, 1969; Rosenfeld, 1971)。在斯坦福咨询服务小组攻读学位的研究生们完成了一系列研究论文,这些论文都是在乔治·斯宾德勒的人类学的观点指导下对学校管理的各种层面进行的研究(Christiansen, 1954; Fishburn, 1955; Sharpe, 1956; Shipnuck, 1954; Tilden, 1953)。一些不属于人类学领域的研究者以其他方法来研究教育管理的相关问题(Becker, 1952, 1953; Iannaccone, 1958, 1962; Jackson, 1968; Lutz and Iannaccone, 1969; McDowell, 1954; Smith and Geoffrey, 1965, 1968),即使为了其他目

---

<sup>①</sup> 希伯报告说在1964年期刊中,1/3的教育研究者都采用了调查研究(Seriber, 1968:274)。我怀疑其中教育行政的研究占了大部分。

的而对管理者进行的研究,有时也会提供一些很好的个案研究资料(Smith and Keith,1967,1971)。在人类学与教育领域,研究文献也并不丰富<sup>①</sup>,而那些尽力研究正规教育系统的人类学家,对教育管理的关注也不深入。这种文献上的空缺无疑激励了本研究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去理解、分析教育管理中人所承担的任务。

此外,一些实际的考虑也推动着本研究的进行。当我在一个专门研究教育组织与管理的研究中心担任研究助理时,我找到了符合自己研究兴趣并与整个中心项目相符的领域。对学校管理者的兴趣不只是因为他们的行为会对整个正规教育系统产生影响,还因为这样的行为也反映了教育亚文化以及教育者身处其中的美国价值观体系。然而,我的学术兴趣与其说是对学校管理细节的关注,不如说是对教育作为一种文化过程的关注。管理之所以吸引我就是因为它与这种过程相关,这既包括它是如何促进或如何阻碍国家教育目标的达成,还包括它是如何产生一些出人意料的结果的。

得益于乔治·斯宾德勒教授对我的职业生涯的重要影响,我的教学及研究中都采用了人类学的观点与技术。在教育研究中,我倾向于从人类学家的视角来处理问题,即采用一种“整体”的方式,对实际情况与当事人所描述的情况或想当然的情况进行区分,或者对那些显而易见的事情进行确认。在教育管理研究中心,我自然地并且是不可避免地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与观点研究管理或管理者。

最近,我被一种日益扩大的教育研究趋势所震惊,这种趋势倾向于进行大规模的、费用高昂的研究,结果却大多是得到一些无关紧要的数据资料(例如,有97%的高中社会学科老师“总是”、“经常”、“有时”会在课堂上讨论政治问题;或者“相对于35%的小城镇的老师,有44%的大城市的老师职业满意度较高”)。人类在大量的数据中迷失,而研究对象却被数据所掩埋。那些研究只是回答了众多问题中的一小部分问题,它们更多地告诉我们研究对象是如何填答问卷的,而较少谈及研究对象在“真实”生活中的行为。因此,本研究是基于对目前过分依赖数据的研究方式的不满与厌烦,虽然这些数据可以迅速地、轻而易举地获得,但是无论研究者如何增加被试的人数或是问卷的长度,这些数据都无法提供处于一定情景中的研究对象实际行为的完整画面。诸如校长们是否认为自己应该在公共场所抽烟或喝酒,是否应该定期参加教堂礼拜,甚至是否应该与教师们一起探讨教师们给校长写的评语等问题,即使研究者的从校长个体的角度对校长进行了观察,但研究结果也很少用数据来评价校长的职务本质。而本个案研究中的校长艾德·贝尔恰巧是烟酒不沾。在他第一次担任小学校长前好多年,他就已经有上教堂的习惯了;他甚至一度考虑传教士的工作。无论艾德·贝尔对准备年度考核有何感想,也无论他对与教师们一起探讨他的考核结果有何感受,他个人认为这样做是否必要或者他是否喜欢这样做都无关紧要,因为这样做是学区的政策要求。

<sup>①</sup> 关于人类学与教育方面的综合文献,可参见 Spindler,1963a; Wolcott,1967; Lindaquist,1971.



在长期的研究过程中,有许多人给予了我指导和帮助,我要向他们致以诚挚的谢意。显然,我首先要感谢的是读者们即将认识的“真正的”艾德·贝尔。我要感谢他的耐心,不仅是因为他接受我这个观察者,还因为他花费了很多时间来表达他的各种真实的感受。我同样也要感谢小学里的教职员、艾德·贝尔的校长同仁们、学区中心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以及艾德·贝尔的家人。虽然我不能说没有他们这个研究将无法完成,但我必须承认在他们的协助下,我才能收集到这些详细的材料。

虽然前面我已经提及乔治·斯宾德勒对我学术方向的重要影响,但我还是感谢他从我的研究开始就表现出的极度关心。他为我日后进行田野研究的程序提出了许多建议,并给出两种思考维度:管理困境以及解决冲突的目的,这两个维度可能对民族志资料的组织有所启发。虽然我没继续探讨冲突解决的概念(或由经济学家巴里·西格尔所提出来的相关建议:研究有限的资源是如何在管理程序上得以分配的),但是我希望其他学生能够注意这项研究的可能性。当我第一次声明我准备成为一个民族志学者时,斯宾德勒给予我许多非常有帮助的意见,并对我的终稿提出了指导意见。

我还要感谢罗纳尔多·罗内尔及伊夫琳·罗内尔,他们也是我在夸扣特尔进行田野研究时的同事,他们对于制订最初研究计划并预测在进行田野研究时可能遇到的问题方面给我提供了帮助;我要感谢 R. 简·西尔斯和约翰·克罗夫特,他们最初与我一起讨论运用民族志方法来研究教育管理。此外,教育管理研究中心在整个研究过程中一直给我以支持,我要感谢当时的两位主任罗兰·格林和马克斯·G. 阿伯特,前一位接受并支持我的最初研究计划,后一位不仅耐心地等待本研究的完成而且始终对本研究充满信心。同时我还要感谢在俄勒冈大学的同事给予我的鼓励,他们是理查德·O. 卡尔森,小 W. W. 特斯,菲利普·瑞克尔,及 CASEA 的布伦特·若斯福特,还要感谢人类学家阿尔弗雷德·G. 史密斯和社会学家罗伯特·杜宾给予我的鼓励。其中,杜宾教授一直坚持我应该收集一些时间和动作的资料,事后证明这些资料非常有价值。

马克斯·G. 阿伯特跟诺曼·德鲁详细地阅读了初稿,并且对后续的改进提出了很多建议。在后来的修订稿中,德鲁孜孜不倦地帮我精简语句,提高录音报告的可读性。我的研究助理约翰·A. 奥尔逊负责访谈及普查资料的整理及总结、论文中地图的绘制、学校与社区大量照片的拍摄,他的妻子凯利则负责第4章文字的编辑工作。至于第1章由阿尔弗雷德·G. 史密斯与马克斯·G. 阿伯特协助编辑,约瑟夫·施莱德负责第11章,罗伯特·B. 埃弗哈特负责后记,罗纳尔多·P. 罗内尔则负责第7章。第7章中的年度工作循环及图形的讨论部分是仿照罗内尔的夸扣特尔田野研究而做的(见 Rohner and Rohner 1970;第2章)。在后续工作中大卫·P. 博因顿,路易斯·M. 史密斯及理查德·L. 沃伦等人也给予了很多建议。读者如果熟悉安东尼·华莱士的作品,你们会在后记中所传达的观念中,看到他的影响力。艾丽·比特夫人负责主要的打字工作,并且监督着整个书稿的完成。